

如果我是美国人,很可能不会去给大大小小的选举投票。倒不是说我这人政治冷漠没有公民责任心,而是我觉得,在美国现行政治体制下,其实选谁都差不多。比如我一直在跟踪观察的马萨诸塞州的州长选举。

如果我是一个麻省公民,我选谁呢?

最有力的竞争者有两个。一个是民主党的候选人德沃·帕崔克,黑人,曾在克林顿政府任助理司法部长。一个是共和党的候选人凯丽·赫利,女性,是麻省现任副州长。

如果我是一个麻省公民,当然有理由关心这场选举。对一个普通美国人来说,州级选举对他们衣食住行的影响,其实比总统选举要大。因为美国是联邦制国家。

对一个普通公民来说,收入税的税率是多少、高速公路上的时速多少、中小学教育质量如何、有多少警察在你家附近巡逻、能否申请有政府补助的医疗保险,这些与日常生活最休戚相关的事情,主要都是由州政府与州议会决定的,不关白宫和参众两院什么事。在很大意义上,对美国老百姓而言,“国计民生”的真正含义,其实是“州计民生”。

抱着关心“州计民生”的热切心情,我大量读报、看电视、上网,努力发掘两个候选人的“本质”差异,最终得出的结论却还是:其实选谁都差不多。

听来听去,我发现他俩在政见上主要差异集中在两个方面。一个是要不要削减收入税;另一个是如何对待非法移民。

赫利坚决主张削减收入税。每次电视辩论,她都把这个问题拿出来,气势汹汹追

【灯下碎语】

## 美国选举选谁都差不多

问帕崔克同不同意减税。她说:“减了税,老百姓口袋里有了钱,经济发展才有动力。”

我想,减税是好事啊。我一共就那么点收入,还老是被挖去一大块税,我当然支持减税了。可后来上网一查,赫利所说的减税,无非是从5.3%减到5%。顿时觉得很没劲,才减个0.3%,却嗓门大到大西洋对岸都能听到。

而帕崔克说:“不错,老百姓的钱是老百姓的钱,但是公路、公立学校,也都是老百姓的公路、公立学校,如果少交税的代价是公共服务的退步,老百姓欢不欢迎呢?”好像也有道理。

再看另一个分歧。帕崔克主张让在麻省公立大学上学的非法移民交相对低的

“州内学费”,赫利反对。帕崔克说,“要给那些学习合格的非法移民一个机会。”而赫利则说,他是在“用合法居民的钱奖励非法行为”。

帕崔克主张给通过驾考的非法移民发驾照,出于“安全考虑”。赫利坚决反对,说这让“控制非法移民更加困难”。双方似乎都有道理,但是说实话,这对我来说,实在是个可以“高高挂起”的问题。

当然两个人还有其他一些分歧,比如同性恋结婚可不可以合法化、要不要支持干细胞实验……分析来分析去,我觉得所有这些“差异”都显得鸡毛蒜皮。0.3%的税收、给不给非法移民发驾照、同性恋能不能合法结婚,对我的生活几乎没有影响,所以对我来说,选谁都差不多。

“选谁都差不多”可以被理解为坏事,也可以被理解为好事。很多人把它理解成坏事。每天,我都可以从报纸上读到无数这样的哀叹:民主党也好,共和党也好,其实大同小异,一样堕落。既然“天下乌鸦一般黑”,我为什么要投票?

事实上,很多人把美国的投票率不高,归咎于美国政党“没有给选民提供一个真正的选择”。专制者更可以声称:既然在民主选举中“选谁都差不多”,那还要选举做什么?所谓选举,不过就是一群戏子做戏而已。

但是我不这么看。“选谁都差不多”这个现象的发生,其实恰恰是两党激烈竞争的结果。正是因为两个政党在竞争中都要争取大量的“中间选民”,所以它们的政见日渐“趋中”,最后往往稳定在最大多数选民比较赞同的位置上。而一个上台的政党代

表多数人的利益,这恰恰是民主的含义。

早在1957年,政治学家Anthony Downs就总结出了两党制下“政党趋中化”的规律。许多后来的经验研究都证明了这个简洁然而意义重大的结论。

从这个角度来说,“选谁都差不多”又是好事,因为它说明不同的政党都在使劲谄媚“多数老百姓”——这不正是“代表最广大人民之利益”吗?好比我喜欢吃面条,不喜欢吃三明治,那么一个党请我吃拉面,一个党请我吃刀削面,我当然“选谁都差不多”了。

投票率低,至少对于某些人来说,恰恰说明他们对政治体制的信任:既然就算不投票,也要能吃到拉面,要么吃到刀削面,那投不投票也无所谓了。5%和5.3%的收入税差别,说实话,怎么看也就是个拉面和刀削面的区别而已。

选举议题的“鸡毛蒜皮化”,在一定程度上,恰恰是美国社会在重大基本问题上达成了共识的表现。这个社会已经完成了对工人能不能组织工会、如何控制大公司垄断、公立中小学如何运营、妇女该不该投票、黑人能不能坐公车前排、言论自由是不是好事、人权是不是一个褒义词等等这些个“重大”问题的辩论。剩下的,至少就国内事务来说,基本都是小修小补的“鸡毛蒜皮”了。

如果一个国家连这些最基本的共识都还没有形成,而我是那个国家的公民,我当然会举着选票跑到投票箱前了。毕竟,在那种政治环境下,选谁会非常不一样,我可不想被人按着脖子,吃下自己不爱吃的三明治。

(摘自《民主的细节》刘瑜著)

【阅案所得】

## 雍正曾对哪位大臣称:朕不知如何疼你

有人说,雍正之所以成功,主要是隆科多和年羹尧两个人,一内一外,在其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曾经有个浙江钱塘的举人汪景祺,因为在仕途上混得不顺利,后来便投书给年羹尧,奉承他是“宇宙之第一伟人”,说唐朝名将郭子仪等人和年大将军相比,不过是“荧光之于日月,勺水之于沧溟”,还说他“制敌之奇,奏功之速”,历史上无人可及。汪景祺的马屁功夫很到位,捧得年羹尧心里乐开了花,于是便将他收入幕中。

后来,汪景祺给年羹尧又上了一书,叫《功臣不可为》。他在书中说,功臣之所以难做,问题出在主子身上。那些主子既害怕别人作乱,又要依靠功臣去戡乱;但平乱后,往往又猜疑功臣,他们认为功臣既然能定乱,必然也能作乱,因此对功臣起疑惧之心;功臣得到主子的封赏后,往往会被小人嫉恨并在主子面前大肆中伤,要是功臣仗着自己的功绩,在主子面前直言相谏的话,往往会被主子认为骄横,进而怒之灭之。如此一来,“进不得尽其忠节,退不得保其身家”,功臣无论如何都要获罪,难逃一死。

汪景祺写书的时候,正是年羹尧得意之时,他没有理会汪景祺的劝告,不料后来年羹尧获罪时这书被发现,反成了年羹尧的一大罪状。在抄年府的时候,侦查人员又发现了汪景祺的一首七言绝句,里面有一句说“皇帝挥毫不值钱”,把雍正气得几乎吐血。结果汪景祺被处斩,妻子发黑龙江给穷披甲人(军士)为奴,五服内的族亲全部革职。

再说那年羹尧,他本是汉军镶黄旗人,父亲年遐龄曾做过工部侍郎,湖北巡抚,哥哥年希尧也曾做过工部侍郎。这些还属平常,关键是年羹尧的妹妹是胤禛的侧福晋,雍正即位后被封为贵妃。如此说来,年羹尧还是雍正的大舅子。不过,年羹尧虽说是标准的皇亲国戚,但他本人是有真本事的。他后来虽然以军功著称,但他年轻的时候却是中过进士的。

因为妹妹的这层关系,年羹尧和雍正的关系自然大不一般,他在官场上也是一帆风顺,他先做四川巡抚、后升为四川总督,康熙六十年(1721年)又做了川陕总督。康熙死后,雍正命他与接替抚远大将军胤禵的延信共同执掌西北军务。由此,年羹尧和隆科多成为雍正即位后的左膀右臂,备受恩宠。

雍正元年(1723年)十月,青海和硕特蒙古部首领罗卜藏丹津趁抚远大将军胤禵回京之际发动叛乱,妄图控制青藏地区,使得本已平静的西北局势再起波澜。罗卜藏丹津的叛乱,对于刚刚上位的雍正是个不小的考验。当然,雍正也可以像大多数建国者一样,利用这个机会把当时对他篡位的质疑给转移过去。于是雍正便命年羹尧接任抚远大将军坐镇西宁,指挥平叛,许胜不许败,以帮助他稳固皇位。

年羹尧也算争气。经过充分的作战准备,在雍正二年(1724年)初,年羹尧下令诸将“分道深入,捣其巢穴”。在短短的半个月内,各路大军跃进千里,将叛军打得落花流水,稀里哗啦。特别是四川提督岳钟琪(当时雍正封其为奋威将军)更是表现神勇,他率军一路狂追,直捣敌穴,匪首罗卜藏丹津仓皇之下,化装成女人才得以逃脱。最后,罗卜藏丹津领着两百多残兵败将投奔了准噶尔部的策妄阿拉布坦,从此一蹶不振。

由此,“年大将军”之威名,大江南北,人尽皆知。

对于年羹尧的功劳(不仅仅是战功,关键还是对雍正初期稳固其皇位的贡献),雍正还是看在眼里的。他曾极为肉麻地对年羹尧说:“朕实不知如何疼你,方有颜对天地神明也。西宁危急之时,即一折一字恐朕心烦惊骇,委屈设法,间以闲字,尔此等用心爱我处,朕皆体得。总之你待朕之意,朕全晓得就是矣。所以你此一番心,感激上苍,如是应朕,方知我君臣非泛泛无因而来者也,朕实庆幸之至。”

(摘自《向康熙学习:历史不曾心软》,金满楼著)



蒋介石与韩复榘

【阅案所得】

## 日军轰炸机的“两副面孔”

后方医院,我心如刀绞——尽管他们都强忍痛苦,表现出非凡的勇气。”

“我之处境使我比任何人都能更好地体味日本侵华之悲剧,因为我懂得,战事一旦爆发,中国也就踏上奋勇前进的大道。在振兴祖国伟业中我所负特殊使命乃协助夫君开创新生活运动,协助重建空军……”

“在国民精神总动员之形势下,这似乎是令人费解的行动。‘自助而后天助’,满洲里战乱使中国认识到这句悲剧性格言真是再正确不过了……”

“南京。无视非战斗人员和人道主义机构——譬如医院,乃上周末日本空袭的显著特征。日本声称具有500个床位的中央洛克菲勒医院为军人占用,95架飞机连续两拨空袭,恶意昭彰地予以破坏。”

“巡视废墟之后,我要毫不犹豫地说:‘这是现代战争

史上最愚蠢、最残酷的行径。房顶上画有巨大的十字符号,足以表明那里是什么地方。150名病人惨死;200名医务人员以及其他人员,共500多人伤亡。”

“有情报表明,日本人决心在空袭中炸死委员长和我本人,这样他们就可以在中国制造混乱,借此扶植傀儡统治者……”

“途经南京(出于军事原因,蒋夫人目前的地址未予披露)。想到其余国土迟早将要遭受的一切,我的心在颤抖。港口被封锁,华北大片地区生灵涂炭,而我们周围的一切亦将沦为废墟。”

“但一个信念主导着我: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美国报刊头版登出了一幅有关中国抗日战争最具震撼力的暴力性画面:一名日军士兵拿绑在柱子上的一具华人尸体练刺刀。数次受到质疑的美联社资深记者誓言该画面真实可靠,事发于9月5日,天津。

“那是一名穿着日军制服的中国士兵假裝的!”东京日本参谋本部的高桥坦中佐对曼哈顿的记者们尖叫着。“我大日本刺刀技术与之完全不同,我可以在此证明!”这名日本军官抓着一支铅笔,伴着战场上的喊杀声朝想象中的敌人刺、捅、挑,绘声绘色,把一名女记者吓得魂飞魄散。

(摘自《中国时代》 师永刚著)

10月初的这一周,宋美龄开始在曼哈顿《先驱论坛报》上发表日记,与罗斯福夫人叙述的故事迥异——比如,罗斯福夫人写道:上周,一只小熊用后腿站起来,如果总统座车不及时开走,它就会给车身抓个记号了。

10月初的这一周,宋美龄开始在曼哈顿《先驱论坛报》上发表日记,与罗斯福夫人叙述的故事迥异——比如,罗斯福夫人写道:上周,一只小熊用后腿站起来,如果总统座车不及时开走,它就会给车身抓个记号了。

下面是蒋夫人日记的摘录:“中国,南京。我刚从上海前线返回,目睹几千名伤员在各急救站耐心等待着转往